



HUAZHONG CHUANBO YANJIU

《华中传播研究》编委会 编

华中传播研究

(第五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



HUAZHONG CHUANBO YANJIU

《华中传播研究》编委会 编

华中传播研究

(第五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中传播研究(第五辑)/《华中传播研究》编委会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622-7823-8

I. ①华… II. ①华… III. ①新闻学-文集 ②传播学-文集 ③出版学-文集
IV. ①G210-53 ②G206-53 ③G23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2809 号

华中传播研究(第五辑)

编 者 /《华中传播研究》编委会

出 版 者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 政 编 码 / 430079

责 任 部 门 / 学术出版中心 (027) 67863220

电 子 信 箱 / press@mail.ccnu.edu.cn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27) 67861321

责 任 编 辑 / 史小艳

封 面 设 计 / 胡 灿

责 任 校 对 / 王 胜

责 任 印 制 / 王兴平

印 装 /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15.25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266 千字

印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22-7823-8

定 价 / 43.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 权 所 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学术对谈】

百家争鸣时代的质化研究方法

——美国著名学者诺曼·K. 邓津访谈 甘丽华 (1)

关于“媒介即讯息”的误读

——与何道宽的学术对话 张瑞希 余雄飞 (6)

与李良荣的学术对话录 余雄飞 曾禹 张瑞希 (10)

【媒介伦理与法制】

文化自信与传播伦理的互洽性探讨 江作苏 刘文鑫 (15)

基于公共视域下电视法制节目娱乐化趋势的审思与探讨

..... 姜海 周逍 (27)

【新闻传播史研究】

论达恩顿书史理论中的文学研究 罗蓉蓉 (33)

《百科全书》与《四库全书》的出版背景对比分析 姚爱华 (40)

【新媒体研究】

网络直播:野蛮生长之后的冷思考 张德华 黄祯辉 (48)

论网络寒暄传播对品牌关系生态建构的积极作用 殷卉 (54)

借“网”生长:公益3.0时代高校支教组织发展的新路径

..... 王逊 龙雨馨 (60)

【“新媒体与社会”国际会议】

个人微信公众号商业化与数字文化生产图景 毕晓梅 (75)

基于人性的新媒体传播场景构建研究 黄杰 (84)

论数字时代动画专业教学向应用化转型的必然性	刘 畅	(93)
边疆民族地区非涉外型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舆论传播与引导	苗 瑞	牟朝霞 (100)
新媒体时代“网络暴力”的成因及应对策略	常民强	(107)
新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发展态势及反思	胡 蕾	(118)
新媒体引起的新闻文体变革分析	李 军	(125)
融媒介环境下的舆论新格局建设探索	姚 婷	(138)

【新闻研究】

双重编码理论对报纸数据新闻生产的启示	张勇军	(149)
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论唐湘岳新闻作品的叙事艺术及与舆论之关系	华 进	张 丹 (158)
从众声喧哗到异口同声：媒体如何再现雷洋事件	许永超	(167)

【传播研究】

卫生计生危机的特点及演化机理分析	严利华	喻发胜 (177)
企业内刊的企业文化功能研究	史小艳	涂洁琼 (185)

【出版研究】

儿童书店的三种创新发展模式及其启示	张 焰	(194)
对中小学馆配图书质量标准的思考	梁上启	阮 喆 (201)
浅议学术出版的遵从与规范 ——基于编审工作的实践	冯会平	(209)
“互联网+”时代教辅图书出版研究	史小艳	(216)

【书评】

出版是一项有理想有文化责任的事业 ——读董中锋教授著《出版理想与文化责任》	沈东山	(225)
《华中传播研究》来稿注意事项		(229)

Contents

【Academic Conversation】

The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in the Era of a Hundred of Schools Interview with the Famous American Scholar Norman K. Denzin	Gan Lihua (1)
Misreading about “Media is Message”—Academic Conversation with Mr. He Daokuan	Zhang Ruixi Yu Xiongfei (6)
An Academic Conversation with Li Liangrong	Yu Xiongfei Zeng Yu Zhang Ruixi (10)

【Media Ethics and Legal System】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ommunication Ethics	Jiang Zuosu Liu Wenxin (15)
Based on Public Perspective: Reflections on the Entertainment Trend of TV Legal Program	Jiang Hai Zhou Xiao (27)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istory】

On the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Dawn’s Book History	Luo Rongrong (33)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ublishing Background of “ <i>Encyclopedia</i> ” and “ <i>Si Ku Quan Shu</i> ”	Yao Aihua (40)

【New Media Study】

Webcast: Cool Thinking after Brutal Growth	Zhang Dehua Huang Zhenhui (48)
--	--------------------------------

A Study of the Active Role of Phatic Communication in Brand Relationship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Yin Hui (54)
Growth on the “Internet”: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Universities in Commonweal 3.0 Era	Wang Xun Long Yuxin (60)

【“New Media and Societ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Individual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and the prospect of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	Bi Xiaomei (75)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Scene Based on Humanity	Huang Jie (84)
Study on the Inevitable Transformation of Animation Education into Application Orientated Education in Digital Era	Liu Chang (93)
The Communication and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on the Non-foreign-related Sudden Social Security Incidents in the Frontier Minority Areas	Miao Rui Mou Zhaoxia (100)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Network Violence in the New Media Era	Chang Minqiang (107)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Reflect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n Emergency Based on the New Medium	Hu Lei (118)
Research on the News Writing Style's Change Caused by New Media	Li Jun (125)
Exploration of Establishing a New Pattern to Guide Public Opinions under Media Convergence	Yao Ting (138)

【Journalism Research】

The Enlightenment of Double Coding Theory on Newspaper Data News Production	Zhang Yongjun (149)
On the Narrative Art of Tang Xiangyue’s News Work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ublic Opinion	Hua Jin	Zhang Dan(158)
From the Noise to the Same Voice; How the Media Represent the Lei Yang Event	Xu Yongchao(167)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Health-keeping Crisis	Yan lihua	Yu Fasheng (177)
On the Corporate Culture Function of the Enterprise Journal	Shi Xiaoyan	Tu Jieqiong (185)

【Publishing Research】

Three Innovative Models of Children's Bookstore and Its Enlightenment	Zhang Jiong (194)	
Reflections on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Book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Liang Shangqi	Ruan Ze (201)
On the Compliance and Standardization of Academic Publication Practice Based on Editorial Experience	Feng Huiping (209)	
Study on the Publishing of Guidance Books in the Internet Plus Era	Shi Xiaoyan (216)	

【Book Review】

Publishing is an Idealistic Cultural Responsibility—Reading Professor Dong Zhongfeng's “ <i>Publishing Ideal and Cultural Responsibility</i> ”	Sheng Dongshan (225)
Central China Communication Studies Manuscrip Guideline	(229)

【学术对谈】

百家争鸣时代的质化研究方法^[1]

——美国著名学者诺曼·K. 邓津访谈

甘丽华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第一夫人担忧地向总统附身过去——这是她最后一个以‘第一夫人’身份完成的动作。总统一脸诧异不解。这个表情她太熟悉了, 在新闻发布会上苦苦思索某个问题的答案时, 肯尼迪就会出现这样的表情。接着, 他无比优雅地举起右手, 好像要去抚平他那头蓬乱的栗色头发。但他的手却在哆嗦, 很快那只手便无力地垂了下去。他原本是要抚摸自己的脑袋, 然而此时他的脑袋已经被炸开了……”

1963年11月22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正午十二点三十分,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教科书仓库大楼的窗边扣动了扳机。肯尼迪中弹了, 一旁的第一夫人杰奎琳本能地探身出去, 试图抓住丈夫的一片头骨。

这一刻改变了美国, 也改变了诺曼·K. 邓津教授的学术生涯。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的第二天, 还是博士生的诺曼·K. 邓津出现在一户人家的门廊前, 按响了门铃。他需要为自己的研究进行问卷调查。房屋的主人出现了, 是一位还沉浸在失去总统悲伤中的白人男子。当听明白诺曼·K. 邓津的来意后, 他变得怒气冲冲, 质问道: “谁给你站在我家门廊的权利?”然后, “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们的访谈就从这一重要时刻开始。

一、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是可通约的

甘丽华(以下简称“甘”): 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的第二天, 您正在为自己

的研究进行调查，当时有一位年长的白人男性质疑您出现在他家门口的正当性。这一顿悟式(epiphanic)的经历为何如此重要，乃至它直接改变了您的学术生涯？

诺曼·K.邓津(以下简称“邓”):当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在国家发生危机的这一刻，我没有权利出现在他家的前门，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我当时尴尬极了，我感到一种耻辱。从那以后，当我向陌生人提出社会科学调查的问题时，从未感到自在过。

甘:您把质化研究划分为八个重要历史时期：传统时期(1900—1950年)，现代主义时期或者黄金时期(1950—1970年)，类型模糊时期(1970—1986年)，再现危机时期(1986—1990年)，后现代时期(1990—1995年)，后实验主义时期(1995—2000年)，百家争鸣的现在(2000—2009年)，未来(2009—)。这些不同时期的转向是由哪些因素带来的？学者们跟得上这些不断的变化吗？

邓:这些不同时期的变化并不是更替式的，它们并存于当下，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激荡。每一代学者都把自己对于批判研究的独特理解带到当下。

甘:对于质化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人们长期以来存在争论。您是这场争论的重要见证人和参与者，并且首倡“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这一概念包括了不同的数据来源、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理论及不同的方法。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使用混合方法的趋势。混合方法同时拥抱不同方法论传统的辩证法和立场，并致力于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您如何评价这种“混合”趋势？质化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是否可通约？

邓:我认为两者是可通约的。乌维·弗里克(Uwe Flick)在其书中写了一章，专门谈论这个问题。^[2]

二、“在这项研究中最大的挑战是学习如何倾听和记忆”

甘:您的著作《酗酒者的自我》在1988年获得符号互动研究学会颁发的库利奖。在这项研究中，您结合使用了民族志式的、深描化的生活史方法和现象学阐释方法。您为什么会想到研究酗酒者这个特殊群体？在研究中您碰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您的研究帮助那些“不可见的人变得可见”(make the invisible more visible)？

邓: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有酗酒问题。在这项研究中最大的挑战是学习

如何倾听和记忆。我相信我的研究为人们深刻理解酒精带来的痛苦有些帮助。

甘：“我们通过向内移动来达到向前进。通过寻找我们自身失去的中心，我们试图创造新形式的真实——源自经验的真实。”自传民族志可以看作一种“向内移动”，但“向内移动”就足够了吗？

邓：当然不够，我们还需要向前移动和向后移动。

甘：在《社会学方法：资料读本》中，您曾提到对于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形成合理可靠的因果性解释(*causal explanation*)。现在您呼吁改变世界：“作为全球性公民，我们不仅要阐释世界，这是传统质化研究的主旨。今天，我们需要通过拒绝非正义，庆祝自由和完整、包容、参与式的民主改变世界。”这种改变是您个人的一种发展还是历史性的进化？

邓：哦，天啊，你刚才引用的这句话出自我的早期著作《实证主义的自我》(*Positivist Self*)。现在我已经有了 180 度的大转变，而这个大转变就是从我冒着雨站在那家人门口准备做社会调查时，这家的主人让我滚出他家的门廊的那个晚上开始的。

三、“社会正义、伦理、赋权少数群体社区将是下一个十年的主要议题”

甘：您曾提到“研究有时候会是一个肮脏的词”。质化研究社区的研究者们对研究伦理问题尤其敏感。您倡导一种“女性主义及社群主义的伦理模式”(feminist and communitarian ethical model)，这种伦理模式的要旨何在？您为什么选择了这种伦理模式？

邓：“研究有时候会是一个肮脏的词”这句话是由伟大的毛利学者琳达·图海维·史密斯(Linda Tuhiwai Smith)^[3]提出来的，意指殖民力量利用研究操纵被殖民地人民。我选择“女性主义及社群主义的伦理模式”，原因在于这个伦理模式本身就是一种赋权。

甘：在最近出版的由您和麦克·D. 贾尔迪纳(Michael D. Giardina)主编的《质化研究——过去、现在、未来：批判性读本》一书中，您和其他六位优秀学者就质化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一场对话。在对话中，你们主要讨论了四个重要的问题：过去十年质化研究的最重要发展是什么？下一个十年即将出现的主要议题是什么？当下质化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机遇

是什么？目前质化研究中最为创新并对未来意义重大的方法(methods)是什么？在这场对话中，您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能请教您自己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吗？

邓：我认为，过去十年质化研究最重要发展是其表演化转向(performance turn)，而社会正义、伦理、赋权少数群体社区将是下一个十年的主要议题。就当下质化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机遇而言，就是如何在公共领域获得更好的接纳。那么目前质化研究中最为创新并对未来意义重大的方法就是那些推动批判研究进入公共领域的方法。

甘：现在让我们转向传播学研究。在该领域，量化研究依然占据主导，在某种程度上，质化研究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有学者在2015年对近12年发表在政治传播的258篇论文做了内容分析，发现只有43篇，也即16.7%是质化研究；而其中首要数据来源于质化研究的只有21篇，占比8.1%。对量化研究的偏好有可能限制了传播学学者对传播学核心问题及现实前沿变革的理解能力。您如何评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质化研究现状？质化研究可以给这个研究领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邓：质化研究直接回应人类传播中即刻(emergent)、互动(interactional)及情感化(emotional)的一面，这是量化研究做不到的。

甘：在中国，现在也有一大批学者和研究者在从事质化研究。您能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建议，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参与全球质化研究社区中，并做出自己的贡献吗？

邓：现在已经有一群新的中国批判质化研究学者，他们在质化研究国际大会^[4]的表现非常活跃。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站：<http://www.utsc.utoronto.ca/conferences/fccqr/en/about-fccqr/>^[5]。

简介：

诺曼·K. 邓津(Norman K. Denzin)，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学教授，传播学、戏剧研究、社会学、批判阐释理论研究员，1966年于爱荷华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加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社会学系。诺曼·K. 邓津教授的学术兴趣包括阐释理论，表演研究，质化研究方法，媒介、文化及社会研究。他已出版个人专著、合著、合编著作50余本，发表200余篇专业论文。他曾任美国中西部社会学协会主席，符号互动研究协会主席。他还是国际质化研究协会创始人及主席，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质化研究国际中心主任。他曾任《社会学季刊》编辑，《质化研究》创始人及

联合编辑,《文化研究一批判方法论》及《符号互动研究:研究年刊》创始人及编辑。

注释:

[1] 非常感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博士生林春峰先生的无私帮助,使得这次跨越一年余的访谈得以顺利进行。

[2] 乌维·弗里克(Uwe Flick)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社会科学及教育质化研究教授,也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提出,以议题和研究问题为导向来选择研究方法。例如,想要了解某种慢性精神疾病的主观体验,研究者应该对一些患者进行传记式的访谈并且进行细节化的分析;而想要发现这种疾病在人口中的发生概率和分布规律,研究者则应该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对于前者,质化研究方法是适当的;而对于后者,量化研究方法更适合。量化和质化两种研究范式应该是互补的,而非互相竞争、非此即彼的“对手”。

[3] 琳达·图海维·史密斯(Linda Tuhiwai Smith)是新西兰哈密尔顿怀卡托大学原住民教育教授,是《去殖民化的方法论:研究和原住民》的作者。书中对西方学者及其研究在原住民文化的殖民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批判。该书被认为对关涉社会正义的研究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她本人因推动毛利人教育而获得“新西兰功绩勋章”。

[4] 国际质化研究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Qualitative Inquiry)由诺曼·K. 邓津教授在2005年发起和组织,至今已举办十二届,今年5月将继续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举办第十三届会议。去年举行的第十二届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研究者,举办了1600场演讲,参会人数达到2200人,成为全球性的质化研究者学习、交流与展示的盛会。

[5] 中国批判质化研究论坛(Forum of Critical Chinese Qualitative Research)是国际质化研究大会的一个兴趣小组,主要由一批在加拿大、美国等地从事质化研究和教学的华人学者、研究生在2015年发起,其主旨在于推动中国批判质化研究的发展,使之成为一种“既扎根本土又面向全球的阐释范式”。

关于“媒介即讯息”的误读

——与何道宽的学术对话

张瑞希 余雄飞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学术对话的方式,从媒介的道德属性、文化自信等方面与何道宽先生探讨了媒介伦理相关问题,并明确了中国学者的媒介环境研究现状,以及一直以来部分学者对“媒介即讯息”的误读。

关键词:媒介伦理 媒介环境 何道宽 媒介即讯息

2017年3月23日,华中师范大学第176期“博雅大讲堂”邀请著名学者、资深翻译家何道宽教授为在场学子做了一场“世界是不平的:什么全球化?为谁的全球化?”的精彩讲演,何道宽与到场师生畅谈全球化实践与中美模式比较观。其间,新闻传播学院的部分师生就媒介伦理相关问题与何道宽进行了对话。

一、媒介的道德属性

学生:麦克卢汉从“媒介是人的延伸”的基本立场出发,认为媒介本身有善恶的道德价值属性,但是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媒介只是工具,出现伦理失范现象是从业者自身的素质问题。您是怎么理解媒介具有道德属性这个观点的?对于当前频发的新闻伦理失范现象,您认为原因在媒介还是从业者?

何道宽:我不太赞成“媒介具有道德属性”这个观点,我认为“媒介”是一种物质,要看你如何使用它。道德价值是人赋予它的,人可以利用“媒介”干坏事,也可以利用“媒介”搞开发、做好事,这都是我们赋予“媒介”的道德价值,所以我认为“媒介”是中性的。离开人,“媒介”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只有人利用媒介,“媒介”才是有价值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媒介”具有道德属

性,而是人赋予了“媒介”道德属性。

二、媒介伦理和文化自信的关系

学生:中国的传播学观念大多源于引进西方的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可能会缺乏一定的文化根基。现在一些新闻伦理的失范,是不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批判不够导致的?您认为媒介伦理和文化自信之间有什么关系?

何道宽:我们先来谈一下文化自信。公元前2 000 年左右,中西方同时出现了哲学、伦理等学术思想的爆发。中国的“百家争鸣”十分辉煌,不说百家,道家、墨家任何一家都是不得了的,当代国人对古代思想营养确实继承得不够好,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因内忧外患,鸦片战争之后的很长时间,中国文化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已经式微,在学者中可能还没有断裂,不少学者还在研究。现在一些年轻人不读墨子、孔子的书,就不能继承古代优秀的思想,那何来的自信?同时,西方猛攻中国政治制度,想摧毁中国的革命传统文化。

三、中国学者的媒介环境研究

教师:您对媒介环境学派的译介工作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据我们观察,中国的媒介环境学的相关研究依然没有成什么气候。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观点对中国现实的启示意义在哪里?

何道宽:对这个问题不要太悲观。中国学者的媒介环境研究正在步步深入,对麦克卢汉研究的三次高潮,中国人都有响应。我曾在2015年第3期的《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殿堂》^[1],对此做了全面的总结。但遗憾的是,文章最后一部分有1 000 多字与中国学者的媒介环境学研究相关的内容没能被发表出来。这1 000 多字介绍了除了我参与主持的几个传播学译丛外,包括浙江大学的邵培仁教授在内的中国学者首创了“媒介生态学”的观念,媒介生态学和媒介环境学中的“ecology”是一样的,也可以说是对媒介环境学^[2]作出了响应。2011年,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新闻界》策划了一个“麦克卢汉研究专辑”,一共有4篇文章,我的也在其中,介绍

了媒介环境学。也是在同一年，南京大学办了一个网站，叫作“紫金网”。紫金网上有一个媒介环境学的专辑，有 20 多篇文章，其中也有我的一部分。此外，国内至少有 10 所院校开设了媒介环境学的课程。可以说，中国的媒介环境学研究正在跟上国外学者的步伐，但至今还没有中国学者自己写的媒介环境学的专著^[3]。

四、“媒介即讯息”的误读与新解

学生：在您翻译的麦克卢汉的著作里面，有一个是“媒介即讯息”，那么能不能反过来说信息是媒介？或者说媒介和信息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是等同关系还是从属关系？

何道宽：这个问题涉及了对麦克卢汉的误读和新解。很多学者把麦克卢汉的这个观点翻译成“媒介即信息”，这是错误的。因为麦克卢汉的原文是“message”而不是“information”，不能翻译成“信息”，只能翻译成“message”，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信使给你传送的信，“messager”给你传送的“message”。我们手机发出的短信叫“message”，这个“message”一定是经过加工的，不是原材料；而“information”是“raw material”，是没有经过加工的，不是“coded”，但“message”一定是“coded”^[4]。

举例来说，人类语言是一个最强有力的媒介，使人类脱离了动物界成为万物之灵，这个媒介的讯息是什么？不是你说“哦！对面山上有老虎”，也不是说经历了丰收，也不是欢呼下雨了。语言这个讯息，是给我们讯息。语言对人最大的影响就是它使我们脱离了动物界。三样东西使我们脱离了动物界，一个是“tool-making”，一个是“fire-using”，一个是“oral language”，即我们会说话，我们会用火，我们会制造工具。这三个方面是我们和动物界尤其是灵长类告别的关键，使我们成为驾驭在动物界之上的万物之灵，这是语言的信息。

到了现代，电脑的信息是什么？电脑的信息不是说电脑给你传送了什么文件，电脑改变了整个世界，这才是它给你的信息。麦克卢汉说电脑是人智力的延伸，是人心灵的延伸，我非常同意。有学者说，将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意识，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AI(人工智能)。很多人都担心，人工智能将来会灭亡人类，我也很担心。它的智力绝对要超过人类的智力，实际上是把人类的智力提升一个档次。大家都知道，最一流的围棋手败

给了 AlphaGo,它的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人类了。所以说人类一定要提高警惕,AI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要适可而止,不能再发展。

简介:

何道宽,1942 年生,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深圳翻译协会高级顾问。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 30 余年,有著作和译作 80 余种,逾 2 000 万字。是最早引进跨文化传播学、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传播学三大学派之一的媒介环境学的学术翻译家。代表作如《中华文明摘要》,代表译作有《理解媒介》、《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帝国与传播》、《媒介环境学》、《麦克卢汉精粹》、《数字麦克卢汉》等。

注释:

[1] 何道宽:《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117~125 页。

[2] 何道宽:《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6 期,第 104~108 页。

[3] 何道宽:《媒介环境学辨析》,《国际新闻界》2007 年第 1 期,第 46~49 页。

[4] 何道宽:《麦克卢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纪念麦克卢汉百年诞辰》,《国际新闻界》2011 年第 7 期,第 6~12 页。